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六二）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三〇期 ——
(二〇一四年二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2b)

【史海钩沉】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源是“宇宙终极真理”	程映红
【百家争鸣】	《五一六通知》指向的是彭真而非刘少奇	文 贝
【文革一页】	李震自杀前后	晏乐斌
【回首文革】	张霖之是被谁害死的？	杜钧福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源是“宇宙终极真理”

• 程映虹 •

◇ 内容提要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在实践中走到如此极端的地步？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为什么对共产党自己建立的制度持如此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换句话说，文革实践最终的理论合法性何在？受话语环境和知识范围的限制，中国大陆对文革的研究至今并没有对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而主要是努力恢复历史真相，促进对文革历史的公众意识的培养，并澄清文革政治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

本文考察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对和宇宙论相关的自然科学的讨论，尤其是物质是否无限可分和时空是否有限。大量的历史材料说明，这种“科学”讨论和文化大革命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在时间上是完全重合的，在内容上是密切相关的。上个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正好是国际科学界对宇宙的微观和宏观的基本秩序热烈讨论并有重要突破的时候，而毛本人和他的追随者对相关讨论不但表现出浓厚和迫切的兴趣，而且力图参与这些讨论或者在中国的语境下对这些讨论作出自己的回应。本文认为，这种“科学”讨论构成了文化大革命

意识形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被玄学化甚至上升到宗教信仰的高度，可以说是从一个最终极的意义上——即文化大革命符合宇宙的根本规律——为文化大革命寻找合法性。这就使得文革从根本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路线斗争和政治清洗。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2013年10月总第54期，由笔者2006年发表于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Modern Asian Studies（《现代亚洲研究》季刊）上的英文论文缩写而来。某些部分有所增加。原文题目是Ideology and Cosmology—Maoist Discussions on Phys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有近2万字，并收集在美国列克星敦出版公司2012年出版的Mr. Science and Chairman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原文有大量注释。）

◇ 意识形态的玄学化

从理论上了解文化大革命，离不开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套概念。毛泽东自己认为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而后者在他看来又比前者更重要。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毛选》中有一系列比较完整严密的理论阐述。但关于文化大革命，至今我们所看到的是毛一些零零星星的讲话和书信，尤其是到晚年的只言片语，以及反映了他的思想的一些决议，可以说是有明确的观念和主张，但缺乏系统完整的论证。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理论完整性的缺乏，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根本谬误所造成的理论困境。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激化。但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逐步消失的历史阶段，这样才会通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的“肃反”针对的是内奸，间谍和叛徒，其理论基础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会有阶级斗争，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自己的对立面。这是斯大林的肃反和毛泽东的政治运动之间理论上的根本差别，也带来了苏共后来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根本不同。苏共领导人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消灭了阶级对抗的基础；毛泽东则坚持社会主义下阶级对抗会从内部不断产生，而且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而更加激烈，这就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继续革命。

那么毛泽东这个理论的根据又何在呢？如果对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做一些考察，稍稍浏览一下当时的报刊，不难看到意识形态话语的玄学化，即越来越多的哲学概念和术语进入意识形态，直接为政治概念背书，甚至取代政治概念。意识形态玄学化的倾向其实从违背科学规律和生活常识的大跃进时期就出现了，到文革前泛滥成灾。从文革时的报刊资料来看，那时的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哲学化”的国度，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普通劳动者，从炼钢炉到麦田和岗哨，人人都会熟练使用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概念来指导具体工作，即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等等。在具体阐发文革意识形态的场合，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观点最有力的根据常常首先就是辩证法的这些基本概念而不是社会现实。毛泽东关于文革的很多讲话充斥着哲学名词，甚至直接源于哲学概念，这和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证很不一样。

笔者认为，正是文革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难以找到合法性这个理论困境迫使毛泽东本人和毛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把意识形态玄学化。所谓毛主义者指的是那些文革之前和文革中阐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既包括陈伯达，康生，林彪和四人帮这些高层领导人，也包括形形色色的“理论家”和“写作班子”的文员。他们对毛泽东文革思想的阐释甚至发挥，在实际影响上构成了毛主义文革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毛本人言论中理论性的不足。

所谓意识形态玄学化不但指用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代替社会科学的分析，即把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等概念直接转化为政治话语，从这些概念中推导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这个结论，也指毛本人和毛主义者从哲学角度出发对当代科学的讨论，即所谓的“自然辩证法”，企图用科学来论证玄学化的意识形态，这是本文探讨的中心问题。简要来说，毛主义认为对立面的存在以及矛盾和斗争是宇宙和自然界的根本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根据这个规律，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还有对抗性矛盾，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就是从这个根本规律出发，所以即使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根据，或者更重要的是，哪怕在实践中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文革也是正确的，必须坚持的，因为它符合宇宙的根本规律。

利用当代科学把意识形态玄学化，对科学问题的讨论在知识论的意义上成为文革意识形态最深层次的结构和基础，这是对文革的研究中至今为止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问题。这里的当代科学指的是和宇宙论——即人对于整个宏观和微观宇宙的基本秩序的探讨——有关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相对论和天体物理学这三大学科。历史的巧合是，上个世纪中期，毛泽东酝酿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时，正好是物理学上述分支取得一些重要进展的时候，为在微观和宏观上解释宇宙的来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观点。而毛主义宇宙论完全立足于哲学推论，它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物质，物质的存在形式是运动，运动的根源是对立面的矛盾和斗争；它相信矛盾和斗争是永恒的，所以物质一定永恒的，其存在形式在微观和宏观上一定都是无限的。

根据这些观点，毛主义相信物质无限可分，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无始无终，凡是符合这些观念的科学发现或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相反就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资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不但如此，任何自然科学研究如果推导出到了自然现象的一定层次，在微观还是宏观上都难以找到人类理性所信赖和想要发现的“真相”和“规律”，就会被马克思主义认为是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而拒绝，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称建立在对于整个客观世界的基本规律的把握的基础上（这就是所谓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僭妄”）。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最初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就是如此，因为这个学派认为到了量子这个层次，“规律”和“真理”都无处可寻。所以，毛主义对宇宙论的讨论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当时世界科学发展的一种回应，但更大程度上是和那个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发展有关，结果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基本粒子，相对论和天体物理学这些探讨物质基本结构和时空维度的科学成了政治上敏感的学科；物质是否无限可分和时空是否有限成了政治问题。

本文从大量材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部分，考察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毛主义对和宇宙论相关的自然科学的讨论，尤其是物质的可分性和时空的维度，揭示这种“科学”讨论和毛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时间上和内容上的密切关系。本文的结论是毛主义对宇宙论的讨论构成了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从一个最终极的意义上——即文化大革命符合宇宙的基本规律——为这个史无前例的灾难寻找合理性。

◇ 物质无限可分——毛主义关于基本粒子的讨论（1955～1965）

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观点是毛主义关于宇宙论的讨论中最重要也最早出现的一部分。它由毛泽东本人直接发起和推动，最初出现于五十年代中期，正是毛开始思考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毛本人的有关谈话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一月中央书记处一次关于发展中国核工业的会议。毛问在场的科学家原子由什么组成，钱三强说是质子和中子，毛又问质子和中子由什么组成，钱答现在科学还没有发现。毛说根据“一分为二”和“对立统一”，

质子，中子和电子一定可分，现在人们不知道是因为科学条件还不具备。毛强调说“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很多人认为“你们不信反正我信”这句毛的名言是他在七十年代初就党内还会不断产生路线斗争这个问题说的，其实这句话的时间要早得多，针对的也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是，两个场合同一句话，跨越了二十年，说明物质无限可分和党内路线斗争在毛那里是同一个“宇宙根本规律”的不同表现，正体现了在他那里“科学”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则说明在毛这是一种信念，有没有证据其实不重要。1957年十一月，毛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领导人会议上又大谈基本粒子的无限可分性，以此说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对立面，并建议各国共产党都要宣传这个道理。这是毛第一次把基本粒子问题和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直接联系起来。

六十年代上半期，就在毛泽东逐步发展对社会主义社会下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些论断的同时，基本粒子无限可分这个问题在他的哲学思考中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在很多场合阐发。1963年下半年某个时候他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读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物理学家坂田昌一1955年发表的关于基本粒子可分性的文章后大加赞赏。1964年一月在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时他说基本粒子可以一分再分，电子也可以再分，这是辩证法的核心。同年八月，毛在北戴河召见了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和龚育之等理论家，特别对物质无限可分问题做了很详细的谈话。他提到列宁也认为物质无限可分，用中国“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古语来论证，还褒扬了坂田。此外，他明确说“世界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无限的”。

就在作了这次谈话一周后，八月23日，毛会见了在北京参加国际科学会议的科学家，坂田也在其中，毛和他见面时赞扬了他的观点。第二天，毛又在中南海召见了哲学家于光远和物理学家周培源，作了长篇谈话。毛开门见山，对他们说找他们来就是为了讨论坂田的文章。毛这次谈话除了再次强调基本粒子无限可分，宇宙在时空上都是无限的之外，还提到了一些更具体的科学问题，例如宇称守恒和不守恒。他说过去人们认为宇称守恒是绝对的，但现在发现也有不守恒，守恒和不守恒是统一的，但也有守恒完全被打破的例子。他据此提出质量和能量是否也有不守恒的时候，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稳定的。他举了华裔美国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振道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杨李为此得到了诺贝尔奖）。

除了物理学，毛还提到了生物学，认为唯物辩证法也应该应用于细胞的研究，说细胞内部也分为细胞核，细胞膜和细胞质，还说细胞之前一定有非细胞，细胞是由非细胞辩证转化来的，有一个苏联女科学家已经发现这个辩证转化。毛这里提到的“苏联科学家”应该是奥尔加·李普辛斯卡娅，她关于细胞由非细胞转化而来的“实验”受到李森科的支持。但在后斯大林时代，李森科失势后，这个实验被苏联科学界揭露是为了迎合政治需要而造假。看来毛并不了解这个事实，他所感兴趣的只是李普辛斯卡娅的实验证明了他所相信的物质的对立统一和辩证转化。

在毛泽东和于光远及周培源谈话过后，时任《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决定将坂田的文章直接由日文翻译过来（毛读的是从俄文的《哲学问题》上翻成中文的）并在《红旗》上发表。1965年六月，《红旗》杂志发表了坂田的“关于基本粒子新观点的对话”，文章前面有两页“编者按”，坂田文章长12页，有很多公式和计算，看上去完全是一篇科学论文，但却刊登在中共中央最高理论刊物上。为使得普通读者能读懂，文章后面还有两个中国科学家为这篇文章涉及的科学问题写的说明和注释，这也是陈根据毛的建议做的安排。这组文章很快被很多报章转载。三个月后，《红旗》杂志在“自然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标题下又发表了6篇中国科学家和哲学家写的文章，作者有钱三强，于光远和龚育之等。这些文章——加上三个月前的那篇编者按——主要是对毛讲话的阐释，很多地方引用了毛的原话，却未加引号（可能因为毛的讲

话是未经整理的内部谈话)，但了解内情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毛的话。

这样，基本粒子问题从五十年代中期进入毛泽东的哲学和政治话语，经过十年的酝酿，在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前一年由《红旗》杂志大张旗鼓地推到了毛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一线。毛本人是这次讨论的发起者，不但主要观点是他的，而且主要用语和表达方式也都在他的个人影响之下。例如讨论中有很多地方有“原子里头”，这四个字，一般来说正式的书面语应该是“原子里面”，但因为毛在谈话中用了“里头”，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便在文章中跟着这样用。文革前夕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事件，至今没有受到任何研究者的重视，更不用说它和文革意识形态之间的前后脉络。

◇ “层子模型”——“中国模式”的基本粒子理论（1965～1966）

毛泽东强调“物质无限可分”，本来是为了论证社会主义下还有阶级斗争，但在把“毛泽东思想”奉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60年代，中国科学界于1965年组织了一个“北京基本粒子小组”，包括了中科院和北京一些高校的近40位科学家，要用当年搞“会战”的人海战术解决当时国际上非常热门的基本粒子的理论问题，在“坂田模型”的基础上超越它，提出一个“中国的”基本粒子模型。这个小组在一年多时间里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40多篇论文，出台了一个“层子模型”。负责这个项目的钱三强说这个名称体现了毛泽东的基本粒子可以一层层无限分下去的“光辉思想”。

1966年中国科学界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国际科学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模型，后来被一些西方科学家称为“毛粒子”。但这个用人海战术发现的基本粒子模型理论不但没有得到实验证明，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可供实验用的假说。就在同一年，两位美国物理学家提出了夸克模型，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重视并得到诺贝尔奖。和“层子”不同，夸克模型把6种夸克视为物质的最基本层次，应该说是“物质无限可分”这个基于辩证法的科学“猜想”的否定。

“毛粒子”或“层子模型”的问世，绝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项目，而是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尤其是在文革风暴将临的关口。如果不是毛本人出于意识形态的需求对物质基本结构的这种近乎偏执的兴趣，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科学界当时会如此兴师动众地用国家权力开展这样一场“会战”。而这样一场“会战”也是毛主义中国对世界科学热点问题的一个反应：当时国际基本粒子领域正面临着一个突破，而中国力图证明毛主义早就为这个科学问题给出了答案。科学，意识形态，个人崇拜和民族主义就这样纠结在了一起。

◇ 批判爱因斯坦和创造“东方科学”（1968～1970）

1966年夏文革正式开始以后，所有科学讨论都暂时中止。但到了1968年，毛主义宇宙论的讨论借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而卷土重来，重点从基本粒子转到相对论，其性质也从讨论转为大批判，完全没有一点说理的成分。北京科学界组织了“批判相对论学习小组”，后来又有“批判相对论办公室”，囊括了中科院和高校的一些科学家，由造反派和毛主义哲学家领头，强迫他们讨伐相对论，召开了多次批判大会，出版了一些内部读物。

为什么要批判爱因斯坦呢？理论原因是在毛主义者看来，爱因斯坦在哲学观念上受被列宁批判的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的影响，主张相对主义，否认客观真理；他的广义相对论推导出一个有限宇宙模型或者封闭宇宙假说，直接和毛主义的宇宙无限论相冲突。政治原因是批判爱因斯坦象征文革从打倒走资派发展到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爱因斯坦是西方学术界的头面人物，造反派认为批倒了他也就批倒了西方科学。

在毛主义者心中，批判爱因斯坦也是文革在文化上从“破”到“立”的关键。当时领导这个运动的陈伯达说：人类文化是在东方（即中国）起源的，传到了西方，现在又回到了东方，但却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毫无疑问，这个“更高的层次”指的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1970年4月陈伯达在北大召开的批判爱因斯坦大会上号召发起群众运动对过去的科学重新评价，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理论都抛在后面”，发出“东方无产阶级的声音”。由此可见，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是毛主义宇宙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陈伯达在1970年夏失势后，上海帮的张春桥和姚文元进一步主导了文革的意识形态，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早在1969年，上海就以复旦大学为中心成立了“上海自然科学大批判小组”，笔名“李柯”（即理科），和北京的批判爱因斯坦运动相呼应。姚文元对这个小组的批判爱因斯坦运动定了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真理观上的不可知论，宇宙论上的形而上学，方法论上的神秘主义”。此外，他还对大批判文章中涉及时间和空间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提法作了详细的批示，防止出现任何一点承认或者暗示时空有限的说法。“李柯”的文章用大号铅字印成特殊版本送毛。1970年夏天姚文元向“李柯”传话，说毛嫌他们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太深奥。于是1971年“李柯”对他们一篇最主要的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做了大量修改再送北京。

◇ 强调不平衡和不对称——毛泽东与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谈话（1972～1973）

1971年林彪事件给文革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带来沉重打击。毛泽东在暂时退却，允许周恩来一定程度上“纠偏”的同时又从宇宙论的角度进一步为文化大革命寻找合理性，表现在他和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谈话中。杨和李是著名华裔美国科学家，毛泽东早在60年代初就注意到他们的研究对于自己的宇宙论思想的用途，在文革受挫之际急于从他们那里找到对自己“继续革命不断斗争”有利的“科学”证据。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方面邀请了一些华裔美籍著名人士来华访问，最早的就有杨李二人。邀请杨李二人来华，是文革中非同一般的事件，一定程度说明了文化上“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破产。周恩来是为了借他们的影响，恢复被文革中断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尤其是让学业优秀的高中生直接上大学。杨李对这一点也深表赞同。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在毛和他们会见时，谈话的重点却在于当代宇宙学的发展。

1973年七月，毛会见了杨振宁，周培源作陪。毛向杨询问了哥本哈根学派和坂田昌一的研究，然后又和杨专门讨论了宇称守恒和不守恒（parity conservation and non-conservation）。毛问杨“轻量子能被再分吗？”杨说科学还没有给出答案。毛说物质一定可以无限再分，要是不能再分，过一千年科学岂不是没有事情做了吗？毛所关心的哥本哈根学派是经典量子力学，由玻尔和海森堡代表，它认为在物质的量子层次，测不准原理取代了通常意义上的“客观知识”，为此它曾经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是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样板而遭到批判，从列宁开始到坂田和毛主义者都是如此。但到70年代它已是国际科学界的常识，所以毛也无法完全否定，只是间接表示他的好奇和疑问。宇称守恒和不守恒研究的是物质世界是否是在平衡中发展的，或者在何种程度上被不平衡打破。毛显然想知道的是不平衡的存在和作用。

1974年四月，毛又会见了李政道，陪同会见的是中国另一位物理学家朱光亚，谈话重点在“对称”（symmetry），这是又一个和宇宙论有关的物理学概念。毛见到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对称如此重要？”李说他知道在中文中，“对称”表达的是均衡和稳定，而在毛看来物质世界发展的动力是不平衡和不稳定，或者说不平衡和不稳定比平衡和稳定更普遍，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应如此，所以毛对物理学如此强调对称感到很不解。毛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举例说自己的右肩比左肩高，但左眼比右眼视力好。李告诉毛说绝大多数自然现象是对称的，也有很多是非对称的，但现象上的非对称不等于普遍原理上的非对称。为了向毛说明这个问题，

他作了一个简单的演示：他拿了一支笔放在一个本子上，把本子先朝毛的方向倾斜，再朝自己的方向倾斜，笔于是先朝毛那一边滚，再朝李一边滚。李说在每一个瞬间，笔的运动看上去是非对称的，但整个过程的基本动力又是对称的。

毛和杨振宁及李政道的会见在中国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文革极端反智的气氛下，很多人对杨李被毛待以上宾之礼感到宽慰，尤其是在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中，杨和李也曾经被作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代表而被点名；对于极左派来说，毛见杨李当然是对极左路线具体做法的某种节制，但毛在会见时对宇宙论问题表达的强烈兴趣又为文革意识形态的发展发出了新的信号，提供了新的话题。

◇ 天体物理学——毛主义宇宙论的最后阶段（1973～1976）

随着林彪和陈伯达的垮台，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为代表的上海帮成为文革意识形态更重要的代表。原来在批判爱因斯坦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上海“李柯”等写作班子在1973年创办了《自然辩证法杂志》。这是一份对于研究文革后期意识形态有非常独特价值的出版物。《自然辩证法杂志》在创刊当年出版了两期，之后为季刊。创刊号的编者按中宣布头三期重点在天体物理学，宇宙学，物理学和生物学。这些学科很明显是为了迎合毛本人的三大科学兴趣：基本粒子，宇宙起源与发展，以及生物的起源。和具体的科学技术领域不一样的是，这些宏大的学科既涉及自然界的基本秩序，又都是“唯物辩证法”的抽象概念和纯粹思辨最有用处之处的，正好适合对自然科学既一知半解又自命掌握了根本规律的人。

在《自然辩证法杂志》头两年半（1973年到1975年）的10期杂志中，至少有13篇主要文章是对天体物理学的讨论，这充分说明天体物理学在这一时期毛主义宇宙论中的重要性。天体物理学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是因为当时国际天文学界的一些发现动摇了宇宙无涯，时空无限这个毛主义宇宙论的基础，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矛盾和斗争的普遍性等等当然也就会成为问题。尤其引起毛主义者不安的是美国科学家在60年代中期发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又称3K背景辐射）和对这个发现的解释。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就发现了河外星系光谱的“红移”现象，这表明这些星系在远离我们。根据这个观察，哈勃提出宇宙在膨胀，如果往前倒推，那么结论是宇宙有一个起点，时间和空间就都是有限的。五十年代俄裔美国科学家伽莫夫进一步提出了“大爆炸”的假说，认为宇宙是有始有终的。这个假说一产生，就受到了苏联科学界和哲学界的反驳和批判，但到了后斯大林时期，尤其是60年代以后，这种批判在苏联失去了势头。到了6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支持了大爆炸假说，因为这个存在于宇宙各处的绝对温度就是当初那个大爆炸留下的剩余温度。

国际天文学界的这些发现和讨论受到文革高潮过后急于了解国外科技动态的中国科学界的重视。1972年，中国科学院停刊5年后刚复刊的《物理学》发表了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方励之的一篇文章，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第一次介绍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和解释，暗示了对大爆炸假说的支持。尽管这篇文章是用纯粹的数学和物理语言写作的，但毛主义者立刻嗅出了其中的异端思想，《自然辩证法杂志》第一期就发表了笔名为李柯和卞思祖的两篇长文，题目是“宇宙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和“3K微波背景辐射究竟说明了什么——批判大爆炸假说”对这篇文章做出回应，声称“宇宙的整体”“既没有数学的解也没有物理的解，只有哲学的解”，意思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对宇宙作为整体具有发言权。它们还指出大爆炸理论是资产阶级科学的遮羞布和政治鸦片，并不注明地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宇宙中的具体事物都会灭亡，但这种灭亡会产生更高级的事物，这就是辩证法。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发表了国际著名刊物《自然》和《科学》上两篇关于大爆炸理论的文章，显示《物理学》上那篇文章是受西方的影响。第二期《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又发表了长篇文章“运动不可能被消灭——对黑洞假说的批判”。黑洞

也是当时国际天文学界的重要发现，它强大的引力对物质的吞灭被毛主义者认为是对物质和运动的消灭，散布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虽然受到毛主义者的批判，中国科技大学以方励之为首的学者们在南京天文台和北京一些科学家的支持下，以国际科学界的观测数据为依据，坚持自己的科学研究。1974年国际科学界发现了一种脉冲双星，它的存在支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一个有限宇宙的观点，也支持了中国科技大学学者的观点。此后，“李柯”和“卞思祖”又“邀请”中国科技大学的学者参加“讨论”，引诱他们发表对红移，3 K微波背景辐射等等问题的看法，并就这些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批判文章。

严格来说，在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学者之间展开的这场论争，也是文革中异端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表面上于它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但它对文革意识形态的挑战是更为深层次的，并对80年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争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泽东和杨振宁及李政道的谈话也反映在《自然辩证法杂志》的内容上并得到进一步阐释。1975年李柯的一篇“论运动的守恒和不守恒——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长文中说物理学的历史表明，很多主张守恒和平衡的法则或定理都或者是破产了或者是修正了，守恒与不守恒是辩证转化的，守恒和平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不守恒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文章还谈到了对称问题，不注明地引用毛的左肩比右肩高右眼比左眼视力好来说明不对称的普遍性。

此外这篇文章还开拓了一个新的话题：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定律又称熵定律，根据这个定律，宇宙间一切热即能量的运动总是从集中向分散，最后导致宇宙的“热寂”，这就得出和大爆炸假说一样的结论，即宇宙的灭亡。《自然辩证法杂志》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在1973年第二期就此已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是热的性质？”杂志还向读者征文，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李柯的文章说这个定律的支持者不懂得热的传播的辩证性质，只看到一个方向，形而上学地把热的分散绝对化。文章还把熵定律意识形态化，说它表现了资产阶级没落的悲观主义，看不到前途，而“无产阶级永远充满信心和乐观地展望未来。”

《自然辩证法杂志》除了在天体物理学领域捍卫毛主义文革意识形态，还继续展开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虽然不像文革初期那么粗暴和简单。1974年一篇批判相对论的文章回顾了苏联学术界对爱因斯坦从批判到接受的过程，把这个过程和苏联变修联系起来，说围绕相对论的讨论早就是一场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斗争了。

值得指出的是，《自然辩证法》杂志在当时是毛主义关于宇宙论的讨论的一个主要但绝不是唯一的阵地。当时的中央一级的“两报一刊”和光明日报也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类似文章，省级报刊也有，有的是从《自然辩证法》转载来的。所以，对宇宙论的讨论，确实是文革后期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现象。1976年“四人帮”下台后，“李柯”和“卞思祖”等写作班子立刻被解散，很多成员被隔离审查，但毛主义宇宙论的基本观点在相当长一个时间里仍然被理论界一些人视为金科玉律，尽管已经不再把它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被否定的政治教条直接联系起来。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认为时空有限，宇宙有始有终的观点仍然被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受到压制，坚持时空无限的唯物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还被当作科学研究的指南。

◇ 宇宙论与文革意识形态——分析和总结

宇宙论是对宇宙宏观和微观基本秩序的探讨。任何总体性（total）的意识形态都是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常常需要在不同程度上把对社会问题的阐释扩大到对自然秩序的理解中，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找合法性。例如，德国当年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意识形态。

《我的奋斗》一书中对其政纲的阐释走的是“自然—种族—国家”这个套路，就是说它要建立的国家以种族原则为基础，而种族原则又是自然的基本原则，所以这样的国家符合自然的基本原则。第三帝国所有反人类的极端种族主义罪行，其最终的“合法性”就在这里。因此，就为自己极端的政治行为辩护而言，第三帝国建立在种族纯洁性基础上的“自然法则”就相当于中国文革政治走到极端时建立在“一分为二”基础上的“宇宙规律”。《我的奋斗》也充斥着一种“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的精神，用先验和武断作为论证的前提。例如“民族与种族”一章开篇第一句话就说“这些真理【即下文所谓自然保护种族纯粹性和排除种族混杂的努力】是如此显而易见，使得很多普通人对它们或是视而不见或是拒不承认。面对这些真理他们好像是盲人，而一旦某个人忽然发现并指出这些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事实时，这些人又惊诧莫名”。

毛主义对宇宙基本秩序的执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在实践上有远远超出了它。马克思主义绝不仅仅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学说，而是把整个自然界包括在内的，这也是它“优越”于其他社会理论之处。这种包容一切解释一切的总体性在很多人那里特别有魅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宇宙基本秩序的解释。熟悉马克思的人都知道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古希腊哲学家德摩克利特的原子论，表现了青年马克思对宇宙基本秩序在微观意义上的兴趣。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有关“宇宙间普遍联系的科学”——这种“普遍联系”当然就是宇宙法则。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都大量涉及自然科学的知识，用它们来论证唯物辩证法。这方面列宁也有《哲学笔记》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但到了毛泽东这里，由于他本人自然科学素养非常有限，只是从实用主义出发临时抱佛脚看一些材料，所以他提到自然科学问题时常常只有寥寥数语，但宇宙真理在手的“信念”却比前人要更为坚定，至少在言辞上。八十年代秘鲁的毛派游击队“光辉道路”领导人古兹曼自认是毛的学生，他文革初期曾在中国受秘密训练，后来号称“安第斯山的小毛”。古兹曼也是哲学博士，他的论文就是研究康德的空间理论。熟悉文革意识形态史的人应该知道，康德是文革中被褒扬的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科学家，他的《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1974年翻译出版，正好是上海的毛主义者关于天体物理学讨论最热烈的时候。古兹曼和他的一些同志都热衷于谈论“宇宙的终极真理”，能在一个很短的演说中从宇宙起源讲到阶级斗争，被一些评论者称为“宇宙真理掌握者”（Cosmocrats，意为依靠掌握宇宙真理而掌握权力的人）。

所以，一个总体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的社会，对自然的探讨常常带有政治内涵，甚至变成政治问题。教会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宗教教条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所有原则，成为总体主义意识形态。天主教认为宇宙是创生的，所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限，因此在欧洲中世纪，主张时空无限成了异端，正好和20世纪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相反。但宇宙论和意识形态原则上的联系和它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在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对物质和时空的科学讨论曾经也必须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反对这个原则的科学家也会受到批判，有关学科和讨论也会被禁止。但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都没有刻意利用这个问题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只有在中国，当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无法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根据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宇宙论才被赋予了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使命。

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共产主义创始人李大钊在他正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也对宇宙基本秩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当时正是国际科学界开始讨论宇宙的有限性问题的時候。李在他著名的文章“青春”（1916年发表于《新青年》）中大谈宇宙万物的创始和运动，宇宙的发展和规律。他相信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而个人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政治活动和行为把它融入宇宙的永恒。在这个意义上，李大钊是在宇宙论那里为个人的政治活动寻找合法性或者说是一种寄托，这和毛半个世纪后用它为文化大革命这个事关全体国家民族的政治运动寻找合法性有相通之处。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阐述宇宙无限时，李甚至提到了当时西方科学界正在讨论、七十年代又成为毛主义宇宙论焦点之一的“热寂说”。他提到了提出这个假说的两位西方科学家的名字（William Thompson 和 Peter Guthrie Tait）和他们的有关研究。李没有对这个假说本身提出反驳，但同时又声称宇宙是永葆青春的，表现了他在科学证据和个人信念之间的矛盾。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所有毛主义者的困惑和矛盾。在七十年代，上海的毛主义者在越来越多的有关宇宙有限的科学证据面前仍然坚称宇宙无限。细读他们的文章，除了“信念”，似乎很难说有别的支撑。这种“信念”在科学面前除了固执己见，就是强词夺理。李大钊对宇宙无限的信念，为我们理解后来毛主义宇宙论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的脚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李大钊和毛主义者对于宇宙无限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执着似乎可以说是幽闭恐惧症的一种表现。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毛主义宇宙论和现实政治的密切联系还可以从以下几个事例中得到证明。毛大力褒扬坂田昌一，主张物质无限可分的同时也是他批判苏联哲学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对抗性的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而这个观点被毛认为是苏联变修的哲学根源。《红旗》杂志在评论坂田的同时发表了批判苏联哲学界的文章，指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批判哲学家德波林的人（德波林主张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对抗性矛盾）现在完全步德波林的后尘。所以，毛主义关于宇宙论的讨论，也构成当时“反修斗争”的一部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1964年八月专门召见康生陈伯达等人谈基本粒子的那个场合，本来是为了布置对杨献珍的批判。这两件事凑在一起绝不是巧合。杨献珍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当时在哲学上提出“合二而一”论。杨被认为是在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后中央高层中比较有反思的人，他的“合二而一”和毛主义的“一分为二”不同，其政治含义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平衡和稳定，反对人为制造和激化矛盾，这很显然和同一时期毛泽东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下的阶级斗争理论有根本差别。和苏联的论战以及对杨献珍的批判都是文化大革命前思想理论界重大的事件，但它们又都和毛主义对宇宙论的讨论有密切关系。这种连带关系，绝不能在我们对文革的思考中被忽略。否则，我们对文革实践背后深层的观念就不会有深刻的理解。

最后再提一个差不多众所周知的历史场合。文革正式开始以前，1966年五月十八日林彪作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强调了资本主义复辟甚至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性，提出了四个重要的“念念不忘”，成为文革前期最常见的政治口号。但讲话中有这样一段，充分显示了毛主义宇宙论话语和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副统帅”思想中的联系：“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辩证法的。哪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有矛盾……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从沙粒到太阳，大到银河系，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宏观世界，小到微观世界，都充满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

本文意在说明毛泽东本人和毛主义者对宇宙论的讨论在时间上和内容上都和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的认识有密切的联系，更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讨论从五十年代中期毛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开始，随着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的成形而发展，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成为文革的理论先声，又随着文革的发展和受挫而以不同的话题和形式为文革意识形态辩护，直到文革结束。毛主义宇宙论和文革意识形态的这种同步和平行关系，对于深层次地理解文革的动力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值得强调的是，毛主义对宇宙论的讨论没有任何科学意义，这在一个具备现代科学基本常识的人看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今天绝不能用来说明毛的科学素养和“远见”。西方学界所谓的

“毛粒子”不过是对一个政治家对科学的浓厚兴趣表示的一点敬意罢了。“毛粒子”是美国物理学家 Sheldon Lee Glashow 1977年在夏威夷一个基本粒子会议上提出的，当时毛去世不久。多年前本文作者通过电子邮件向Glashow先生了解过有关情况。今天，不要说毛泽东关于宇宙论的那些充满玄学色彩的猜想，就连恩格斯那本著名的《自然辩证法》，在20世纪科学家眼中也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和毛主义纯粹的猜想和信念不同，恩格斯的那本书中有很多具体的科学内容，包括计算和公式，表现了作者对那个时代科学的发展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这本书是在恩格斯死后很久出版的，当时恩格斯遗嘱执行人和手稿保存者伯恩斯坦把它的手稿送给爱因斯坦征求意见。爱因斯坦当时在政治上是西方科学界中倾向社会主义的左派，但他看了全部手稿后断然否定了其科学价值，并说“我确信，如果恩格斯看到隔了这么长的时间，他的那一点微薄的努力竟然还被认为有这么重要，他一定会觉得十分可笑的。”

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说，毛主义关于宇宙论的讨论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宇宙秩序和政治合法性之间被虚构出来的关系的例证，其价值又超出了文革研究。这种关系的假定和言说通常只存在于前现代社会中。中国历史上玄而又玄的“天命”论就是如此：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天”——即被虚构出来的宇宙的道德秩序。从埃及，巴比伦到玛雅，世界其他文化中均不乏这样的言说和信念。在统治阶层中，有时世俗君主从祭司那里寻求神权的支持，有时君主是道成肉身，本人就体现了神权。这样的传统，在现代社会其实并没有绝迹，不过“科学”成了神权的新咒语。

□ 《领导者》杂志总第54期（2013年10月）

~~~~~

## 【百家争鸣】

《五一六通知》指向的是彭真而非刘少奇

• 文 贝 •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66年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文件。不仅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载入史册，包括他形成和通过的过程至今存在较大的争议。

### ◇ 《五一六通知》的起草

主流的说法是：1966年4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康生传达毛泽东在上海的几次谈话内容，由于毛泽东已经对彭真定下了“犯错误”的调子，书记处系统地揭发彭真在民主革命各个时期的“错误”。这个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小组的《二月提纲》的错误，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穆欣、陈亚丁、尹达、张春桥。

原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回忆录的描述是：4月9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到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王任重记录的特点是谁的话都记，但只记要点。我的记录是毛主席的原话，但是别人的插话就记不下来了。我一看他的记录同我的不尽相同，就没有往外拿我的记录稿。王任重起草文件，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4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前面说法与李雪峰的回忆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会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后者说的是将毛主席的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到全党。而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不单纯指起草《五一六通知》，王任重提出的才是真正的《五一六通知》原始作品。

#### ◇ 《五一六通知》的通过

李雪峰回忆录描写的过程是：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

中央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是采访王光美的黄峥是另一种说法。《王光美访谈录》——《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黄峥：据我所知，《五一六通知》在通过时一字未改。本来会上有些同志提出，文件中有用的用语、标点不妥，提出改正。但陈伯达、康生等强调文件已经经过毛主席先后8次审阅修改，一个标点也不让改。王光美：是这样。”

“一个标点不让改”的说法从此流行。其实王光美只是认可了黄峥的话，这个观点并不是她发明的。显然黄峥有引导成份在里面。此后，陈伯达、张春桥等借口毛泽东已审定而坚持不让改，最后原封不动地付诸通过成了最流行的说法。

后面一种说法与李雪峰回忆录中的“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正好相反。

在其它参加会议的当事人陈伯达和王力的回忆录中，也没有出现任何刘少奇及其它人提出反对《五一六通知》的内容。

而且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的不是起草小组组长陈伯达，而是邓小平。说明起草小组当时是由中央书记处领导的，隶属中央政治局是在新的文革小组成立之后。

显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五一六通知》有反对意见的说法并不成立。可以说他们“敢怒不敢言”，却不能说提过反对意见。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五一六通知》之所以没有修改，因为这个文件在4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基本通过，这次只是正式上会而已。

而且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省以上的决议都是有专门的起草小组进行草拟，经过多次讨论后才提交大会正式通过。这种通过只是走形式，基本上是全体一致举手通过。

#### ◇ 彭真的下台

彭真的《二月提纲》是1966年2月提出来的，虽然多次受到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的批评，但彭真仍然在位并参予中央各种活动。包括三、四、五月份的中央会议都参加，其中在5月11会议上还和别人争谁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

同时，彭真在此期间还组织了北京文化界展开了对姚文元文章的论战，也就是历时三个多月的“京海派”文化领域大论战。

直到中央表决通过《五一六通知》时，彭真仍然参加会议。据说《通知》要对彭真进行点名批判，刘少奇问彭真：“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彭真说：“一个检查，一个改。”刘少奇问：“对通知有什么意见？”彭真答：“没有意见。”

决定对彭真免职的决定是刘少奇主持的5月23日会议做出的。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调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李雪峰任北京第一书记。

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彭真一直再没有出山。这是高层干部少见的现象。毛泽东连邓小平都能安排出山，却不原谅彭真。而彭真在文革后重新出山的1979年4月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整个革命战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他力主对四人帮和林彪集团成员痛下杀手，却不反对毛泽东，个中缘由值得思考。

#### ◇ 中国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指向的是彭真而非刘少奇

《五一六通知》中有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在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很多人像是突然醒悟一样，认为《五一六通知》中所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刘少奇。其中尤其点出“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而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把手，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其实这种认识不一定正确。

首先，《五一六通知》的基本内容是批判《二月提纲》，并且明确指出“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而且其中提到彭真的名字或“提纲的作者”、“作者”达八次之多。它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

其次，1963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时，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改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对刘少奇工作的肯定。

毛泽东在1964年7月就说过：“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三是《五一六通知》虽然经过毛泽东修改定型，但中央会议通过并贯彻执行都委托给刘少奇，本人连北京都不回。如果“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毛泽东不会如此放心。

四是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后来的谈话中都认为这个“赫鲁晓

夫式的人物”指的是彭真，并没有怀疑到刘少奇头上。

五是刘少奇自己也没有意识毛泽东指向的是自己。1966年5月18日刘少奇在会见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时向他通报说：“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

六是当时一些领导人已经点明指的是彭真。贺龙5月19日在大会发言中对彭真说：“主席批评赫鲁晓夫在我们身边，那还不是批评你呀！”康生也在大会上指责彭真说：“你就是这样的人物，你就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张春桥在上海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一段，我当时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没完全想到刘少奇。”

七是即使在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刘少奇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与刘少奇虽然在四清运动中有分歧，但真正决裂是因为刘少奇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从而把他打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行列。而且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上出现的，是专为刘少奇设置的一个“头衔”。

其实把《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戴到刘少奇的头上是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就像“反革命”这个帽子可以随便扣一样。就当时而言，这个帽子扣向的是彭真，而不是暗指刘少奇。当然，当倒下时无论是扣反革命、修正主义、阶级敌人，还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没有问题，因为他们之间是贯通的。

□ 选自《文贝，博客中国》

~~~~~

【文革一页】

李震自杀前后

• 晏乐斌 •

1973年10月21日晚，主持公安部工作、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的李震，突然自杀身亡，吊死在他住房地下管道上。李震自杀来得突然，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与疑问。纵观公安部在文革中的经历，不难看出李震自杀的前因后果。

◇ 文革中公安部的处境

文革十年浩劫，公安部是个重灾区。新中国成立时的公安部第一任部长罗瑞卿，为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为维护社会治安，惩治犯罪，维护和巩固国家安全，功不可没，1959年9月他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公安部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2003年1月《群众出版社》出版）一书记载：“1965年12月8日—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罗瑞卿被打倒，成为‘文革’中最早受害的高级干部之一，公安部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点部门。（1966年）8月19日—29日，公安部召开部机关文化大革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诬蔑彭真为‘大党阀’，罗瑞卿为‘大军阀’，十二局局长狄飞为‘反革命分子’，常务副部长、中共八届候补委员徐子荣为‘右派分子’，诬蔑副部长刘复之、凌云，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尹肇之等人是徐子荣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和‘罗瑞卿地下公安部的主要成员’。会后，徐、刘、凌、尹及一批局级干部相继被批判斗争，停职检查。”

文革之初，在全国掀起了“砸烂公检法”的高潮，公安部首当其冲，在北京，被煽动起来的造反派、红卫兵，1967年冲击公安部机关、北京市公安局机关达数十次之多，人数多的一次达万人。全国各地出现了冲击公安机关、监狱、劳改队和看守所，出现了打砸抢公安机关，抢公安机关档案，揪斗公安民警和领导干部，曾一度使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工作陷于瘫痪。在公安部，先后以“61个叛徒集团”罪名，逮捕关押了副部长徐子荣和副部长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尹肇之，1960年已调任青海省省长的原副部长王昭，亦遭逮捕关押；曾任罗瑞卿秘书、1960年调任青海省委秘书长的王仲方被逮捕关押，并在公安部和全国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以罗瑞卿、徐子荣划线，深挖、追查“罗瑞卿分子、爪牙、帮凶”300多人；五十年代初曾当过罗瑞卿警卫员的吕亭阁，1957年3月调到贵州省贵阳市一家企业工作，文革中当成“罗瑞卿爪牙”揪斗、批判，徐子荣、王昭在狱中遭受残酷迫害，折磨致死。

1966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沈阳军区第四政委李震主持公安部工作，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同年12月调21军政委施义之任公安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1968年初，谢富治将党组改为领导小组，后又改为核心小组，中央又调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曾威、空军八军副军长赵登程为部领导小组成员。

1967年2月11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随之，对全国公安机关实行了全面军事管制，除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内部造反派夺权，军管会人员支持造反派夺权外，全国其余地方公安机关的权力一律归军管会，军管会控制着公安机关的一切，推行极左路线，在各地公安机关已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仅北京市，据《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揭露：“11月3日，李震和北京卫戍区（军管会）负责人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关于北京市公安局内少数暗藏的坏人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和措施的请示报告》，把北京市公安局一大批党员干部诬陷成叛徒、特务、资本家。报告说，仅北京市局（不包括分局、县局及附属机关）即查出‘三反’分子109名，地富反坏右分子、叛徒、特务、资本家和敌伪军政警宪人员286名。10名正副局长全是‘三反’分子”。“11月18日，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拟订了一个《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提纲》，诬说原市局是‘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招降纳叛，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汇报声称，共查出‘三反’分子111名，特务、叛徒、地富反坏右分子258名，敌伪军政警宪、资本家人员306名，本人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家庭被杀、关、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斗争的1018名，以上共计1693名，占全局干部总数的12.7%。其中正副科长124名，占科级干部总数的18%；正副处长、分局长117名，占同级干部总数的80.7%；10名正副局长，全是‘三反’分子。提出彻底砸烂公安局，大砍组织机构，大量精简人员。”

1967年11月5日，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三人到公安部机关，查封了公安部的全部档案，先后从军队抽调710名干部、战士到公安部清查档案，1968年7月3日正式开始。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关于组织清档队伍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完全由军人参加，原公安部干部一个也不参加，完全由军队干部负责。”报告称，“清档任务主要是清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及徐子荣、汪金祥、杨奇清、凌云等人‘资敌、通敌’，矛头指向毛主席的罪行”。其次是为“指控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提供线索、证据”。清档工作由曾威领导负责，到中央政法干校进行。1970年1月，李震、施义之、曾威向周恩来、汪东兴、谢富治报告称：公安部的清档工作现已结束，历时一年半，清理了全部档案31.2万卷，挖出罪证233件，俱已送中央各有关专案组，还接待了各省市专案调查2万人次，向他们提供了罪证6000余份，其中有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和资敌、通敌等类罪证与线索。同年3月初起草的《关于完成审查、清理公安部档案情况的报告》上报中央，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李震、施义之、曾威、赵登程等人，利用清理档案搜集的所谓“罪证”，都是

颠倒是非，诬陷中央部分领导同志和罗瑞卿、徐子荣等公安部领导，以及地方上的一些领导与干部的不实之词。清档工作在极左思想指导下，不仅销毁了大量内部资料、图书，对档案材料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档案中凡涉及到对“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有不敬字句、言论”，都从案卷中将字迹挖掉，或干脆将案卷销毁。

1968年初，谢富治与李震、施义之、曾威等人，将公安部工作人员，除挑选40人配合、协助调入公安部的军人工作外，其余1500多人全部调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举办学习班，集中审查一年之久。开始进学习班的人，不准回家，通过审查，作出如上述处理之后，才有所放宽。到1969年春节后，将这些工作人员全部，连同100多户的家属、子女，共近2000人发配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劳改农场“五七战校”，安家落户，要他们作好“长期安家落户当农民”的思想准备，“五七战校”白天下地劳动十二三小时，晚上集体学习，检查、汇报思想，有言语不慎，或表现不满的，受到批判斗争。当年3月底，珍宝岛事件爆发，谢富治等人怀疑公安部这些人中有投奔苏军的嫌疑，便将其中的20多人转移到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劳改农场监督劳动。

1970年8月23日—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毛泽东就陈伯达抛出的“天才论”，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实际是敲山震虎，警告林彪一伙，接着在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据《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记载：“1970年12月12日—1971年2月11日，公安部召开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革委会主管公安工作的负责人和公安机关军管会的负责人，以及公安部机关各单位负责人。军队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保卫部负责人和最高人民法院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李震主持”。“会议开始后，与会的一些人员对建国后十七年的公安工作猛烈批判，全盘否定。毛泽东听说座谈会开得很紧张，找纪登奎等人谈话，要求进行引导，并指出：‘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还有好的，不要批得灰溜溜的。’会议气氛有所缓和，但基调仍未能改变。1971年2月8日，周恩来接见了会议全体代表……对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的状况作了基本估计……他指出，‘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公安工作，要看主流，要看红线。这十七年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条红线领导全国，不然怎么会有今天？一共开过十四次公安会议，主席亲自过问的有十次，而且还有许多具体指示。各条战线，主席管得最多的，一个是外交战线，一个是公安战线。不要说文化大革命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等于否认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指出，‘整个公安队伍，还是好的，不要以为公安干部都不好，那就危险了’。”

1971年“9·13”事件，林彪外逃摔死，当即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批陈整风、批林整风运动一经在全国开展，公安部和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受左的思潮的冲击有所缓和，气氛活跃起来，开始批判林彪极左路线。中央决定对林彪集团成员进行专案审查，便从公安部下放黑龙江省笔架山劳改农场劳动的工作人员中抽调一部分回来参加此项专案工作，加之几年来公安部工作荒废，从1972年开始，也陆续从那里调回工作人员到部机关开展公安工作，对全国的公安工作加强领导与指导。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因患胃癌不治去世，终年63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追悼会。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对谢富治的悼词，开除他的党籍。

1972年7月9日，周恩来原则批准以中央名义，公安系统抓紧解放干部，撤销军管。

八、九两月，周恩来多次公开发表讲话，批判极左思潮，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公安部的政治环境有所宽松缓和，1972年、1973年从黑龙江省笔架山劳改农场劳动的工作人员陆续抽回一部分。被抽回的人中有参加中央一办（查办中央一级领导人专案）、二办（军事系统专案）、三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一级的）专案的，一部分调回部工作，使荒废了的工作慢慢恢复。这时，工作人员的言语行动慢慢放松起来，开始议论一些话题，在一些学习会上批判林彪等人的极左路线和极左政策。到了后来被纪登奎、施义之等人当成“算旧账”，上纲上线为“发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

◇ 李震自杀

就在这时，1973年10月21日晚，主持公安部工作的李震突然自杀身亡，吊死在他住房地下热力管道上。李震自1966年9月从沈阳军区第四政委的职务上调到公安部，担任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掌握公安部文化大革命运动，充当谢富治最得力助手，最可靠的骨干。谢富治通过依靠李震掌握、控制公安部的全盘工作，李震自杀时是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部革委会主任。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阶平主持下，医学专家林钧才、董炳琨、吴蔚然、陈敏章，以及上海、广东、天津、北京省市公安厅局的法医李延吉、陈仲芝、吴声屯、韩木林和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验所检验师朱燕、首都医院内科医生张孝骞等专家，对李震尸体解剖、检验和现场勘察，1973年11月9日，由这些专家签名，写出的书面报告，报送中共中央。这个由专家写出的报告肯定是自杀身亡，列举的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李震是自己走向地下管道间吞服“速可眠”药品后上吊自杀的。可是施义之等人不顾现场勘察、医学专家尸体检验、解剖的结论，硬说李震不可能自杀，说没有自杀的理由，一口咬定是谋杀的，把自杀当成谋杀案件来侦破，将公安部副部长、核心小组成员于桑、刘复之当成“谋杀”主要嫌疑人，由施义之、曾威、赵登程等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于10月25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事先将于桑、刘复之撇开，不让他们参加）后，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定施义之为公安部核心小组牵头负责，并指出李震之死，存在自杀和他杀的两种可能。25日当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杨法中对于桑、刘复之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们保护审查”，关押到北京安定门外交通干部学校监护所。于、刘在拘留期间，施义之等人组织人搜集整理了于桑、刘复之1970年在“批陈整风”和1971年“9·13”事件后开展的“批林整风”的一些大小会上，他们发表的一些不同的意见与看法，上纲上线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印发了《于桑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刘复之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各一份，于桑的这一份3000余字，刘复之的这一份4000多字，发给公安部各单位，发动公安部机关工作人员开展了对他们的大规模揭发批判。

《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记载：“10月21日夜里，李震吊死在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一时间原因未明，‘四人帮’及其党羽借机滋事。23日至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此破案工作，委托华国锋负责，纪登奎、吴德协助，重大问题报政治局解决；同时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于桑、刘复之等蒙冤被关押审查。党的核心小组由施义之牵头负责。11月11日，正在中央举办的‘读书班’学习的祝家耀（王洪文一起造反起家的十届中央委员）和杨贵（中央候补委员）被派公安部工作，任核心小组成员，与施义之等人一起，也认定李震是被人杀害的。侦查人员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现场勘察，解剖尸体化验，现场痕迹检验，以及各种方式的模拟试验，完全证明李震自杀而死。”“围绕李震死亡的原因，在公安部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王洪文等人未经调查就说是被阶级敌人谋害的，要追查凶手。施义之、祝家耀等人封锁事实真相，硬说李震不是自杀，是被害死的，甚至一口咬定是被于桑、刘复之等谋害。他们以破案为名，在公安部大搞逼、供、信，实行白色恐怖。”出差去外地工作的人，电话通知他们立即返回机关，讲明情况，接受审查。受审查的133人，

其中局级干部29人，处级干部31人，弄得公安部机关人心惶惶。

《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记载：“在侦查人员肯定李震是自杀的以后，施义之等人不让宣布这个结论，说什么‘即使不是他杀也是被逼死的’。施义之等人长期掩盖李震自杀和他们借机诬陷于桑、刘复之的真相。”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3月，经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告，中央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据调查证实，李震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有几件涉及到他的罪行受到追查而畏罪自杀。在1977年12月公安部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向到会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和公安厅、局长，以及公安部全体干部传达了中央批准的公安部党组关于李震自杀问题的报告，李震自杀的真正原因才大白于天下，揭开了数年的谜底。

历史往往会捉弄人，无论是李震，还是罗瑞卿，既是时代的紧跟者、害人者，也被时代所捉弄。罗瑞卿在任公安部长10年间，以莫须有罪名冤枉了不少好人。1951年1月24日罗到广州，以“英国特务”罪名，逮捕中共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兼广东省公安厅厅长陈泊，同时以“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罪名，逮捕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因两陈被捕株连而逮捕审查的广东省公安厅700人、广州市公安局300多人，两陈屈死监狱；1952年2月，罗瑞卿的一份调查报告上讲湖南长沙市公安局局长王丕敏的一些劣迹，后此报告罗报送毛泽东，后毛在此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罗令将王丕敏逮捕，“三反”中王被处决；1955年4月3日，罗奉命将潘汉年以“内奸、叛徒、特务”罪名逮捕，株连逮捕100多人，潘被关押22年病逝，株连其妻董慧，也冤枉坐了15年牢，病逝。1954年底罗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以“内奸”、“反革命”罪名逮捕，关押28年，株连上海市公安局700人逮捕审查；1955年5月奉命将胡风逮捕，株连逮捕、审查2700多人；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在公安部打右派64人，定中右（准右派）49人。

以上两陈、王丕敏、潘汉年、扬帆、胡风、公安部反右等冤案，七八十年代均已纠正平反。

□ 《炎黄春秋》2014年第1期

~~~~~

## 【回首文革】

张霖之是被谁害死的？

• 杜钧福 •

文革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部长是煤炭部部长张霖之。他于1967年1月22日在被长期关押、批斗、殴打后死亡。生前备受折磨，死状极惨。但是究竟他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又是哪些人犯下了这一罪行，至今模糊不清。

在网上见到一些关于此案的描述，都是出自一篇文章《第一个蒙难的部长》（秦晓鹰《历史的错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这篇文章说，张霖之在文革前得罪了江青。但是关键问题可能是文革初期煤炭部里一位部下的诬陷。这位部下想当副部长不得，就写了一份材料《愤怒揭发张霖之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次讲话》，说张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前说过：“第一任都很厉害，古时的秦始皇现在的毛泽东。”这位部下是谁没说，只说是在解放区搞过兵工厂的。

1966年9月2日，国务院工交口负责人批准并报周总理同意，叫“张霖之同志暂时离

职休养”。

据事后戚本禹交待，在11月到12月间（可能是12月14日），有一次中央文革开会，康生说张霖之反对毛主席，是彭真圈子里的核心人物，是彭真的死党。后来江青召见矿院群众代表，宣布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于是，张霖之在外地收到“立即返京，接受群众教育”的电报，于12月18日返京，19日“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到了北京矿业学院接受批判。

戚本禹12月24日来到矿业学院讲话：“煤炭部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炮轰煤炭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得很对，做得很好！但要打倒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这个炮火还不够，还要继续炮轰，狠狠地打击！”

于是“煤炭部那个没当上副部长的‘老干部’和另外几个人，正在策划更大的、更残忍的迫害。12月8日，在煤炭部大礼堂举行的批斗会上，这位‘革命领导干部’果然亮相了。”对张霖之进行了“揭发”。

张霖之受到残酷殴打。在这篇文章中点了施暴者李××、戴××等人，还有“反到底”战斗队负责人王××。还有“汾西矿务局的李××来京，还带来一顶特制的60多斤重的铁帽子”给张霖之戴上。他总共被关押30多天，被毒打52次。

1月21日，矿院造反派庆祝“夺权”那一天，他被游斗6小时，晚间又遭殴打，于次日死亡。

以上是秦晓鹰文章的描述。现在有网文《矿院回忆之六——矿院简史》（楠竹2007的博客，2012）说“1967年1月21日，矿院举行庆贺‘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大会，随后1967年煤炭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张霖之多次在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和矿业学院批斗，在矿院南边某楼被批，夜间被关押，一夜过去第二天早上发现在厕所上吊自杀（疑案？）。”明确说他是自杀身亡的。

1970年7月31日，国务院给煤炭工业部发出关于张霖之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据说是周恩来起草的。《通知》说：“国务院业务组于1970年7月31日会议，审查了煤炭部军代表1970年5月20日和7月31日两次报告，以及首都驻北京矿业学院工、军宣队专案组1970年5月17日的报告，同时，并阅看了反革命分子戚本禹1966年12月24日在矿院的公开演说。大家一致认为：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张霖之同志在矿院全校广播中听到戚本禹反革命分子这种威胁和煽动的语言，而身体已受到重伤，自不能不陷入极度紧张状态，因此，致张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根据当时情况，矿院专案组的报告只涉及各项经过的表面现象，还需要依照煤炭工业部所掌握的全面材料，认真地予以澄清。”《通知》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也是认为张是自杀的。当然是自杀还是被杀，丝毫不能减轻施暴者的罪孽。

施暴者是谁？在1983年审判戚本禹时，在辩护人的发言中指出，“主要凶手有王业春、刚守堂等人”（《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其中王业春可能就是上述文章中说的王××。迫害张霖之是戚本禹被指控的三项罪行之一。

我不知道这些毫无人性的打手是否已受到应有的惩处。即使在文革那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罪行也是不可饶恕的。

还有，这样的责任不能光由动手打人的打手来负，其主使者组织者也许要负更大的责任，正如清华武斗中团派打死人蒯大富要负责一样。那么是那个组织要承担责任呢？

矿院文革有自己的特点。这特点也许就是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的原因。1966年6月16日，在中学红卫兵的影响下，矿院红卫兵成立。也和当时的中学红卫兵一样，完全由高干子女组成。当时矿院和矿院附中红卫兵都受到工作组压制。据说他们找到了煤炭部长张霖之，得到张的支持，成为反工作组的造反派。他们在8月27日和北航红卫兵、人大红卫兵等一起成立了全市性组织“一司”。

8月初矿院工作组撤走时，他们组织了首都红卫兵和筹委会继续统治矿院。“在院筹委会的组织下，组织了一个137人的‘劳改队’，其中主要是主管教学的干部、基层干部和一般群众。劳改队里，剥夺参加运动的权利、剥夺人身自由，强迫每天写一次活动汇报，必须按规定的路线回家，中途不许东张西望，不准出校门，家里来往信件要上交。劳改中进行人身污辱：每天劳动一次点名、三次示众，劳改后低头听训话。”（《矿院文革回忆之三——文革初的北京矿院》，南山闲人的博客，2012）到1966年12月24日戚本禹到矿院讲话的时候，似乎仍是矿院红卫兵和首都红卫兵对立的态势，而中央文革是支持矿院红卫兵的。这个矿院红卫兵和当初成立时可能有所变化，正如人大红卫兵在开始时完全是“红五类”的组织，后来中央提出干部子女不再担当群众组织领导，他们就退出了，使得组织成分改变，接近一般的造反派红卫兵了。

但是到了1967年初夺权的时候，情形有所演变。“当时，北京矿院红卫兵组织林立、名目繁多。”这是因为“红卫兵组织中间也由于认识和行动的分歧而不断发生改组和分裂。”“1月21日，矿院‘东方红公社’抢先成立了以陈××为首的27人‘矿院革命左派夺权委员会’，宣布夺了矿院的党政财文大权。3月18日，矿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到底公社’和‘北京公社’三个红卫兵组织实现所谓‘大联合’，成立了‘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5月29日，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北京矿业学院革命委员会’，委员96人。”（《中国矿业大学之变迁——“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学生在线，2008）

到了1968年，矿院的“东方红公社”属于“天派”，与之对立的地派叫做“革命到底兵团”。由此可见，矿院的“东方红公社”可能不属于“三司”系统。

上面说矿院“东方红公社”抢先夺权，就是说他们在当时并不占绝对优势甚至不占优势。当时局面是“组织林立”，而且由于历史发展的关系各个组织的色彩可能也是模糊的。所以这个张霖之未必死于“东方红公社”之手。如果他死于“东方红公社”之手，在所见文献中应该指出的。没人指出，想必有隐情。

当然疑点不止于此。在1966年9月2日部长张霖之“暂时离职休养”以后，是谁在掌管着煤炭部呢？又是哪个“组织”在12月叫他去矿院接受批斗呢？这些人对张霖之的惨死没有责任吗？还有，部里那位诬陷者是谁？这诬陷又有什么背景？

张霖之的死也许早已注定。1965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说提出疑问，问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斩钉截铁地立即回答：“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就凭这个，张霖之的命运就决定了。他也许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词发明以来的第一个相关的牺牲者。

□ 选自作者博客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